

方法比较中的质性研究： 传统、问题与发展趋势

陈家建

摘要 社会科学具有极强的方法多样性。从方法比较的角度来看，质性研究的传统优势在于自然性、开放性、理解性三个方面。但因为个案整体性的增强，新的分析技术演进，以及大数据研究的兴起，质性研究在经验事实、分析技术、方法范式三个方面面临困境。困境也在促成质性研究的演进，新的分析技术、方法规范在逐步产生。在分析内容层面，多个案饱和式调研、多维度资料、社会总体机制解释是重要的发展导向。在分析技术层面，话语和文本的多元分析能力是质性研究的发展方向，能够更大规模处理资料。在分析范式层面，未来的质性研究可以借助量化研究和大数据研究，在个案信息拓展、解释机制提炼和解释机制验证多个方面提升研究能力。

关键词 质性研究 整体性个案 计算社会科学 大数据研究

作者陈家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4-0127-11

相比于其他学术领域（人文、理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最具多样性。在传统的方法体系中，量化研究方法（quantitative research）、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历史研究方法（historical research）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新兴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实验研究方法（experimental study）、大数据研究方法（big data research）等都在社会科学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些方法从哲学理念到操作技巧都存在很大差异。方法的多样性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难度，因为其他学术领域虽然也有多种研究方法，但其内在差异性远小于社会科学。理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才能从中思考质性研究的价值和局限。^① 本文尝试基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比较，解释质性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分析当前质性研究面临的困境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一、质性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特点

Qualitative research 这一概念在中文的语境中界定多样，“质性研究”“定性研究”“质化研究”“质的研究”等都常作为学术用语使用。有文章专门对不同的中文概念进行辨析，认为概念差异来源于方法区分。^② 本文对此不做辨析，统一使用“质性研究”来概称 Qualitative Research。质性研究重在方法论的意识，而不是方法的细节，所以去纠缠具体的概念用词意义不大。本文对质性研究的理解是：在社会科学中，追求实证资料的完整深入性，通过典型个案来论证观点的研究方法。不追求案例数量，而侧重案例的典型性，资料详实

^① 加里·格尔茨、詹姆斯·马奥尼：《两种传承：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刘军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23年。

^②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系列丛书：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

深入，这是质性研究最大的特点。更通俗而言，质性研究是追求资料质感的方法（与追求资料数量相对），这一界定大众更容易理解。

质性研究在现代的科学主义方法体系中较为特殊，通常是在与量化研究的比较中被认知。与量化研究相比，质性研究三个方面的核心特点需要重点阐释，因为这些特点决定了质性研究的价值以及在当前面临的困境。这三个核心特点是自然性、开放性、理解性。

（一）自然性

质性研究直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注重在自然情景中搜集资料。相比而言，量化研究方法更多采用变量简化和场景控制的方式开展调查。比如，一个大型的问卷调查，必然需要前期的问卷设计，问卷就是将研究信息进行简化和标准化的过程；同时，问卷调查需要研究对象脱离工作或生活过程来回答问题，这是一种场景控制（去情境化）的调查方式。社会科学研究人的行为，场景控制必然因为外在干预而影响真实的社会信息表达。自然性的调查与此不同，调查过程在研究对象的工作或生活中展开，可以在真实情境中获得研究资料。情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只有回到情境中才能更真实的搜集资料，也才能更确切解读资料的意义。^① 情境还原，是其他研究方法的短板，同时是质性研究的关键价值。比如，在深度参与式观察中，研究者可以跟研究对象一同工作或生活，在日常的场景中搜集最真实的资料。^② 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所有的质性方法都能做到自然性，比如很多访谈也是脱离自然情境。但好的质性研究能够通过长期深入的田野观察，实现自然场景资料搜集，这是内在的方法优势。

因为其他研究方法都不具备完全自然性的特征，所以质性研究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量化研究、实验研究等方法因为存在信息简化和场景干预，研究资料与真实世界总是存在距离，制约了社会科学的解释能力。^③ 而质性研究因为来自自然场景，所以资料更具有情境性、实践感，更能贴近社会现象本身。例如，在《小镇喧嚣》一书中，作者对乡镇政府的研究都是在当地真实的工作和生活场景中展开，研究者参与研究对象的工作和生活，是典型的、极具自然性的社会科学研究。^④ 在这样的研究方式下，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获得了最真实的资料，能够描绘乡镇治理隐微的细节，所以这本书带来很强的实感，这是其他研究方法难以达到的效果。

（二）开放性

量化、实验研究是一套流程，标准且严格，由此保证研究的科学性。而质性研究不是流程，是过程，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质性研究需要预先进行研究设计，但又需要超越研究设计，因为研究设计会因为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分析能力不足，与实际的调查情境脱离；而且，因为调研常常需要在真实场景中展开，而且需要跟研究对象互动，研究过程必然具有开放性，需要根据情境调整研究策略。相比于量化研究的封闭性，质性研究的开放性可以超越研究设计的局限，获得更多样化的信息，这是质性研究的关键优势之一。^⑤

比如，在《全球猎身》的序言中，项飙自述了这项研究的开展过程。在原初的设计中，研究者是想开展移民社会中的文化与空间研究。但进入真实的研究情境中，研究者发现了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的社会流动如何支撑了全球的 IT 产业，让 IT 业可以灵活运营。^⑥ 这项研究展现了开放性的特点，可以超越研究设计的局限，获取预期以外的、多样的信息。理论上，开放性使得质性研究是一个无限期的过程，可以不断获得预期以外的新的资料，让研究可以不断拓展，跳出研究者的主观认知局限。这是其他研究方法所不具有的优点。

（三）理解性

与自然科学相比，理解人的主观意向是社会科学的重点，因为理解主观性才能真正认识社会行为，从而

① 周飞舟：《将心比心：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② 折晓叶：《“田野”经验中的日常生活逻辑：经验、理论与方法》，《社会》2018年第1期。

③ 伊冯娜·S. 林肯等：《再论范式的论争、矛盾与新兴的融合》，载诺曼 K. 邓津、伊冯娜·S. 林肯：《质性研究手册（方法论基础）》，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④ 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⑤ 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社会》2018年第3期。

⑥ 项飙：《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王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解释社会现象的内在机制。^① 在社会科学的多种研究方法中，质性研究对理解主观意向具有特殊的优势。量化研究虽然也能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主观层面的信息，但大部分主观信息难以通过问卷的方式获取，而且调查的效果也很有限。而质性研究，因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互动，可以较好达成主观理解。^② 布若威的名著《制造同意》展示了质性研究的理解性的优势。在这项研究中，作者通过参与式的观察与访谈，理解了工人为何会主动参与赶工游戏。布若威认为，理解了工人的主观意向，才能揭示资本主义体制再生产的关键。^③ 如果没有深度的质性研究，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只能停留于外在描述，难以解释社会行为的真正机制。

二、质性研究的当前困境

质性研究因为自然性、开放性、理解性三方面的特点，在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格局中具有较为独特的价值。但在当前的社会情境和方法体系下，质性研究却面临着问题甚至是困境。这种困境来自三个层面：经验事实、分析技术、方法范式。而且三个层面同时出现，让质性研究可能面临未曾有过的方法困境。本文将就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展开论述。

（一）经验事实困境：从个体性个案到整体性个案

质性研究以个案分析为基础，包括单个案研究和少量个案比较研究。但什么叫做个案，个案在方法论层面的形态如何，本身又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所有的个案都蕴含着社会体系的整体性维度，个案本身就内涵着整体性社会。^④ 但这种蕴含关系具有差异性，从经验层面来看，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地方社会群体与社会整体的关联较弱；而现代社会中，任何社会群体都深度嵌入到整体性的社会关联中。涂尔干用“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来概括这两种关系。由此，可以在方法论层面对个案做出两类区分：个体性个案与整体性个案。所谓个体性个案，是指在研究议题的维度上，个案本身呈现出较强的独立性。整体性个案，是在研究议题的维度，个案是整体因素的具体呈现。^⑤ 当然，个体与整体，都是一种相对区分，但这种相对区分对质性方法具有重要影响。对于个体性个案而言，因为影响个案的因素在个案内部就可以考察，具有相对于其他个案和社会系统的独立性，所以研究者只需要对个案有深入的调研就能较好理解个案本身。但整体性个案不同，个案不是独立的，而是整体因素的呈现，只调研个案是不行的，不理解社会体系，就难以理解个案。

从概念上区分这两种个案比较抽象，本文以社会科学的具体例子来解释这两类个案的差异。乡村治理是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议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法学等学科都对乡村治理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⑥ 但是，之前的乡村治理研究和近年来的乡村治理研究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因为个案的类型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乡村治理研究中，虽然宏观因素也会对村庄产生多方面影响，但一个村庄的治理具有相对的经验独立性，可以理解成一种个体性个案。比如，传统村治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乡村的宗族、大姓、能人、集体资产等，这些因素主导着乡村的社会格局。而且，这些因素在不同村庄相对独立，每个村的宗族、能人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从村庄自身生长出来的。因此，传统的乡村研究呈现出来的村治，具有“一村一式”的特点，每个村庄的治理形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传统的村治研究中，研究者只需要深入到村庄当中开展深度调研，基本就能探寻到解释乡村治理的影响因素。从个案当中寻求个案的解释因素，是个体性个案明显的方法论特征。^⑦

但近年来，乡村治理的研究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方法层面的调整，更是来自乡村运行逻辑

①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② 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③ 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④ 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⑤ 本文的目的是对经验研究中的方法应用进行讨论，所以此处是从经验层面讨论个体性与整体性的问题，指整体性机制在经验层面对个案产生影响的程度。此处不涉及哲学层面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也不去辨析个体与整体的若干逻辑类型。

⑥ 吴毅、李德瑞：《二十年农村政治研究的演进与转向——兼论一段公共学术运动的兴起与终结》，《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⑦ 吴毅：《双村百年：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辑的转型。^①当前的乡村治理,已经呈现出极强的整体性特征,村庄治理的影响因素不是来自村庄内部,而是整个国家治理的体系。比如,很多研究揭示,基层党建、财政项目、目标管理等自上而下的因素决定着当前的村庄治理,这些因素都是关联于国家整体性的规则体系。^②因此,乡村治理在当前呈现出整体性个案的特征,村庄的治理规则不是来自村庄内部,而是来自国家体系。^③研究对象的变化也带来方法的演变。在当前开展村治研究,仅仅在村庄内部调研,即使资料再深入和立体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理解国家体制的整体才能解释具体的村庄。

“个案模式”对质性研究方法具有重要影响,整体性个案的转变带来研究难度的增大甚至方法层面的困境。首先,在研究定位方面,质性研究虽然是研究个案,但同时必须具有整体视野。质性方法聚焦个案,但不是说研究者只懂这一个个案,而只是拿一个个案作为论证材料进行分析。这在整体性个案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者必须能关注到与个案相关整体现象、总体机制,才能理解个案的定位。第二,在实证经验层面,质性研究对象需要从局部经验拓展到整体经验。局部经验是指理解个案本身的经验现象,而整体经验是要超越个案,理解经验总体。这种转向极大增加了质性研究对经验理解的要求,整体性个案需要掌握的经验事实远远超过个体性个案。比如,当前研究乡村治理,不仅需要理解一个具体村庄的信息,还需要了解财政分配机制、目标考核体系、干部人事管理等信息,这些经验都只能在村庄以外的层面才能了解到。例如财政是在县级层面进行分配,要理解一个村庄的财政逻辑必须要进入到县级层面进行调研。^④这样的知识要求极大提升了个案研究的难度。第三,方法范式层面,传统质性研究中常见的朴素经验主义失效。朴素经验主义,是指在个案调研中依靠大量时间投入开展信息搜集,以此实现个案的饱和式理解。比如,在村庄的田野调查中,可以通过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对村庄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事件进行充分调研,达成对村庄的全面理解。朴素经验主义在个体性个案中是经典而有效的方法。但是面对整体性个案,朴素经验主义方法失效,因为决定个案运行逻辑的要素不在个案本身。今天去做村庄调研,如果还是只在村里参与观察,即使时间再长,也理解不了村庄运行的关键逻辑,因为是整体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决定着一个具体村庄治理的运作。

两类个案模式的差异不仅出现于乡村治理这个领域,其他的个案研究都面临类似的转型。比如,数字时代的劳工研究已经转向了新就业群体,外卖骑手成为学术热点。传统的劳工(比如车间工人)研究多是关注劳动的具体工作和生活场域,因为通过具体场域的调研就理解劳工。但对外卖骑手的研究则有不同的方法路径,研究者不仅要调研外卖骑手本身,还需要理解在线平台的技术、算法、管理体系等。这些要素都是抽象的系统,与具体的工作生活场域是不同的研究对象。之所以会将抽象系统纳入研究,是因为新就业群体已经高度嵌入数字平台中,如果不对整个数字平台的运行逻辑有理解,那也难以研究一个具体的外卖骑手。^⑤传统劳工与外卖骑手的差异体现出了个体性个案与整体性个案的不同,所以也呈现出了研究方法的转变。在社会的系统性越来越强的时代,个案本身的独立性降低,个案越发具有整体性特征。个案类型的转变给质性研究方法带了巨大的挑战。个案研究,不能只研究个案本身,需要理解个案所嵌入的社会系统,这在研究视野、经验知识、调查方法多个层面都对质性研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也带来了当前质性研究的困境。

(二) 分析技术困境:新的分析技术对质性方法的取代

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变迁带来了许多新的分析技术,这些分析技术已经或可能取代一部分质性研究的分析方法,这是质性研究困境的另一个方面。

传统的质性研究资料分析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特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因为观察、访谈等资料搜集过程都是研究者深度参与,资料的意义解读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理解。例如,在一个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

① 村庄治理研究的转折点开始于 2006 年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从资源汲取转型为资源反哺,财政资源开始大量自上而下进入乡村,同时带来干部管理、目标考核多方面的变化,村庄治理越来越明显纳入到国家整体机制。

② 陈家建、刘伟:《行政与自治之间:社区财政的二元属性及其治理机制》,《学术月刊》2023 年第 5 期;李祖佩、钟涨宝:《论村级治理行政化——以乡镇政府中心工作推进为切入点的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20 年第 10 期。

③ 景跃进:《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再思考》,《治理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④ 焦长权:《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社会》2019 年第 6 期。

⑤ 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

查，很多文化意涵必须在当时的情境中才能理解，只有调查者自己能解读并转译成学术资料，很难将其变成客观、标准的信息。资料的主观解读造成了学术争议。比如，玛格丽特·米德的名著《萨摩亚人的成年》中，作者通过田野调查，认为萨摩亚人在随和性的文化环境中成长，没有西方人的青春期躁动。但另一位人类学家弗里曼认为，米德在她的研究中夸大了萨摩亚文化中青春期经历不同于西方社会常见问题和困扰程度，资料的主观解读过强，造成了结论的偏误。^① 这个学术“公案”展现了质性研究在资料分析层面可能存在的主观性偏误。第二方面的原因是资料的多类型。相比于量化研究着重标准化的问卷调查，质性研究的调查方式多样，资料类型也多样。在一项质性研究中，访谈话语、观察记录、文档材料、统计数据、视频影像等都可能是研究素材，都需要分析。资料类型多就难以标准化，难以标准化也就很难进行客观分析。同时，不同类型的资料需要相互借鉴印证，必须依赖研究者个人的判断。所以，在质性分析中，主观启发式解读是常见的资料分析方式，解读哪些资料、怎么解读、从解读中获得什么信息，都往往来自研究者个人的风格。

传统的质性研究资料分析方式带来两方面的弊端：第一是资料的分析标准差异较大，同一个资料可能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可验证性低；第二是资料的分析数量有限，因为是个人启发式理解，个人的分析能力有限，不能解读太多的资料，只能选择有限的、启发意义大的资料。这实际上出现了质性研究中一个难点：资料的“事实性饱和”。质性调查研究理论上是资料越多越好，但因为主观分析法的限制，使得一项研究中能够被有效分析的材料是有限的，搜集的资料多了其实也没用。比如访谈，一百个访谈得出的资料肯定比二十个访谈理论价值更大；但实用性层面未必如此，因为一个研究者不大可能深入分析一百个访谈资料，主观的注意力是高度稀缺的。如果让多个人来参与分析资料，那又导致多个分析者的主观理解难以通用的问题，还是存在资料分析能力的瓶颈。所以，资料的“事实性饱和”是传统质性研究方法不可避免的问题。主观资料分析法在传统的质性研究中较为通行，因为没有替代性的方法；但在今天的学术背景下这类资料分析方法就面临困境，因为新的分析技术在某些情境下能够比个人启发式的资料分析更客观、更全面的分析质性资料。

计算分析技术的发展给质性资料分析带来了新方法。近年来，新兴的机器学习方法让大规模的文字信息分析成为可能，机器学习可以对语词的内在含义、上下文关联、语气程度等信息进行较为细致的识别。^② 在质性研究中，访谈以及文本都可以转换为文字，都可以作为机器学习的分析材料。新的分析技术对质性带来两方面的变革：第一，在资料分析的数量方面，原来的质性资料只能靠研究者小规模分析，导致资料的解读局限于小规模，信息量有限。而计算分析技术解决了质性资料分析的难点，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处理大规模数据，能够破解质性研究中资料“事实性饱和”的问题，资料的增量能够带来研究解释力的提升。第二，在资料分析的标准层面，传统资料分析依靠研究者的主观诠释，而新的算法导向的文本、话语分析，可以挖掘资料的内在结构，实现从诠释到结构的转向，从而带来更客观的分析标准。^③ 因此，新的计算分析技术，通过算法来解读质性资料，可以在信息的分析数量和客观性两个层面显著提升质性文本的分析能力。

因为当前的质性研究局限于传统的资料分析模式，没有合适的研究实例可以解释新的资料分析方法对质性研究的影响。所以本文只能列举非质性研究的例子，说明机器学习方法与资料分析的关系。刘河庆、梁玉成《政策内容再生产的影响机制——基于涉农政策文本的研究》一文提供了一个计算机技术分析的参考实例。^④ 这项研究是对政策文本的分析，虽然不是质性研究，但其资料分析的目标在质性研究中常见，学术逻辑相通。在传统的质性研究中，面对政策文本，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主观理解进行分析，通过一些简单的比较，比如词频分析等，理解不同政策文本之间的关联。如果政策文本较少，研究者主观分析法是有效的。但政策文本数量较大时主观分析法就难以有效了，因为研究者自己不可能仔细识别大量政策之间的关联。在这项研究中，作者采用机器学习的分析技术，用词向量模型（神经网络模型应用）来分析一千两百多份政策文本。在分析技术层面，词向量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将文本作为单词序列提供给单词嵌入层，该层将每个单词映

① 弗里曼：《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李传家、蔡曙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

② 裴雷、孙建军、周兆韬：《政策文本计算：一种新的政策文本解读方式》，《图书与情报》2016年第6期。

③ 胡安宁：《以文本为基础的的社会科学研究：从内容分析到算法模型》，《学术论坛》2022年第1期。

④ 刘河庆、梁玉成：《政策内容再生产的影响机制——基于涉农政策文本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

射为向量空间中的实数向量，这一模型减少了文本的维数，同时保留了单词间的语义关系，进而有效地考虑了文本中的词汇语境等信息。在词向量的基础上进行文本相似度的计算，能够通过判断词义、语气等方面的客观差异，从而区分不同省份的政策文件与国家政策的关联，有的省政策是主动制定，政策有具体化；而有的是象征性制定政策，地方政策是对国家政策的简单复制。

通过这项研究的实例可以看到，机器学习的方式能够识别语义，包括文本和话语（不一定是大数据资料，可以是传统的质性资料），而这都是质性研究常见的分析素材。相比于主观分析法，机器学习客观性强，同时能够分析大规模资料。采用这样的资料分析方法，可以打破资料“事实性饱和”的问题，让更多的质性资料能够实质进入到分析过程中，对研究产生效力。要注意边界，计算机技术分析资料虽然有很多优势，但不能完全取代研究者的主观分析。质性资料的意涵具有一定的情景性，很多访谈话语、政策文本的意涵不能从词语本身来判定，还需要结合调查当中的综合情景，并通过观察的资料来验证。所以，情景性的根本特征使得计算分析技术不能完全有效分析质性资料。但毫无疑问，计算分析技术让质性资料分析有了新的空间，大规模的访谈和文本资料能够实质性被研究。从这个意义来讲，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面临困境和挑战。

（三）方法范式困境：大数据研究对质性方法的挑战

大数据的兴起给社会科学带来许多新的变革。但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大数据对传统量化分析的影响，因为相比于传统的抽样数据，大数据研究的数据来源更多样，分析的数据规模更大，而且模型的多样性更强，这对传统的量化研究造成了冲击。^①而大数据研究与质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却被忽视。实际上，大数据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范式，对传统的质性研究也在产生很大的影响，可能导致质性研究的方法范式困境。

相比于传统的量化研究，质性研究的优点是：资料自然生成、开放式研究变量、对主观意向的理解。如前所述，传统量化研究是调查数据，调查过程会导致信息脱离真实场景。而好的质性研究可以自然观察，在真实情景中获取资料。同时，量化研究要提前进行变量设定，只能调查固定信息，而质性研究是开放过程，可以获得研究设计以外的新变量。另外，访谈、观察等方法带来的深度理解也是质性研究不可取代的优势，量化研究大多分析外在指标，对行动者的内在理解较少。因此，传统的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虽然看似对立，但其实两者是互补的关系，质性研究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

大数据研究的兴起则改变了传统量化与质性方法的格局，因为大数据同时具有质性研究的部分优点，以及量化研究的大样本优势，对两种传统方法都形成了挑战。首先，大数据的一部分资料是自然生成的，比如网络购物数据、社交软件数据、交通出行数据等。自然生成的数据不同于调查数据，自然性强，这与质性研究的优点有相通之处。其次，大数据是开放变量，不受固定的问题限制，可以不断拓展研究议题。另外，大数据是多维资料，有很多主观表达类的信息，比如聊天记录，能用于真实理解研究对象的主观意向。^②可以看到，大数据方法具有资料自然生成、开放式研究变量、主观意向理解三个方面的优势，这与质性研究具有很高的重合度，使得质性研究的优势不再是独一无二。而且，大数据有海量的信息，还有各种新的数据分析技术，使得大数据可能取代一部分质性研究，造成质性研究的范式困境。

罗家德等《大数据和结构化数据整合的方法论——以中国人脉圈研究为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③对于人脉圈的研究，传统的学术范式是通过质性访谈或调查数据开展分析。而新兴的大数据方法提供范式创新的可能。这项研究的新意在于利用社交软件的大数据来分析人脉圈。社交软件大数据是人们自然生成的，可以用于观察真实的社交行为，没有人为调查的信息失真。而且，社交软件带来的是多维度资料，可以对人脉进行立体的观察。比如，在这项研究中，可以通过共同朋友数、共同群数、共同群互动频率等客观信息分析社会交往的强度；同时，也可以通过聊天内容来分析社会交往的主观表达。另外，大数据带来的信息是开放的，可以不断新增议题，资金往来就可以成为传统研究变量以外的分析维度，从中理解社交关系的类型。上述研究内容，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完全实现，但只要数据渠道开放就可以实现。这也展示出大数据研究的意

① 罗玮、罗教讲：《新计算社会学：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

② 刘河庆：《观念流：一个分析数字时代信息扩散与观念演化的新视角》，《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6期。

③ 罗家德等：《大数据和结构化数据整合的方法论——以中国人脉圈研究为例》，《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

义，自然生产的、开放式多维度数据，可以对很多质性研究议题有新的分析。例如，生活史一直是传统的质性研究议题，量化方法难以开展此类研究。但大数据方法却具有分析个人生活史的可能，可以通过分析一个群体的社交软件、消费数据、交通出行、餐饮消费等大数据，展现一个群体的人生历程（在学术伦理许可的情况下）。当然，大数据不会完全取代质性方法，大数据研究的自然性不包括情景还原能力，难以将研究资料放到特定的情景中解读，深度理解的能力受限。但是，大数据有潜力取代一部分质性研究，这种趋势必须为学界所正视。

三、质性研究的发展趋势

量化研究技术一直在不断演进中，比较之下，学界常误以为质性研究方法一成不变，今天的质性研究与传统的学术经典之间似乎在方法层面没有差异。客观而言，质性研究的方法演进远少于量化研究，但不能就此认为质性研究没有变化。特别是在当前，因为经验现象的变化、新的分析技术兴起，以及不同研究范式的竞争，质性研究出现多个层面的困境，研究方法必然会变化。基于近年来笔者对学术趋势的观察和与相关学者的讨论，本文在此讨论质性研究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体现于分析内容、分析技术、分析范式三个方面。

（一）分析内容：整体性个案的研究

质性研究是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社会现象内在的逻辑发生了变化，质性研究的分析内容就必然面临调整。如前所述，在系统机制越发重要的当代社会，个案的内在逻辑出现了转型，个体性个案转变成整体性个案，传统的个案方法出现了危机。在此背景下，以个案作为分析对象的质性研究需要进行方法调整。因此，未来的质性研究，首要的趋势是直面社会现象的变化，能够在内容层面开展整体性个案的研究。

所谓整体性个案的研究，是指质性研究不仅分析单个的具体个案，而是能够对个案所嵌入的系统有理解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个案的意义。要实现整体性个案的研究，就不能只对单个具体个案展开调查分析，需要有三个角度完善质性研究的方法规范：数量维度，对一定数量的个案进行饱和式调研；资料维度，搜集多维度资料；理论维度，对个案的整体机制进行解释。

首先，在数量维度，个案研究不能只是对单个个案的研究，需要对一定数量的同类型或相关个案进行考察，而且最好是饱和式调研，在此基础上才能研究一个具体的个案。质性研究的文章，大多数都是围绕单个个案做分析，但这并不是说这项研究只调研了一个个案，只是以这一个个案作为例子来解释文章的分析框架。注意，在质性研究中，个案只是一种表达的载体，而不是不调查研究的全部内容。比如，在开展社区研究时，研究者如果只调研一个社区，那是难以理解这个社区真正的特点，因为只有对当前社区治理的整体状况和逻辑有所考察后，才能理解一个具体的社区。^① 因此，要研究一个社区个案，应该是对一类社区有一定数量的调研，最好是饱和式的，即了解这一类社区各个方面的特色。而在写成质性论文时，选择一个社区作为案例，只是因为这个案例的资料相对完整深入，便于论证，研究者的认知绝不是只限于这个案例。因此，在未来的质性研究中，开展一定数量个案的调查研究应该是方法规范，没有数量层面的积累，不能盲目写作质性研究文章。当然，具体多少个个案，这难以有明确的规定。试图给一个通用的标准是没有意义的，也是误解了质性研究的特征，不能用量化的标准来界定质性研究的个案数量。^② 质性研究要做多少个个案，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数量问题，而是一个研究质感的判定，其标准在于能否达成一类质性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标准（本文篇幅所限，难以详细解释质性研究信度与效度的问题）。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是信息饱和，即在分析维度上，更多个案难以提供边际信息增量，这标志着研究者已经对这一类个案的情况和内在机制有较为充分的把握。^③ 在信息

① 肖林：《“‘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② 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③ Mario Luis Small, “‘How many cases do I need?’ On science and the logic of case selection in field-based research,” *Ethnography*, Vol 10(1), 2009, pp. 5-38.

饱和的基础上开展的个案研究才能是整体性个案的研究，对研究对象有更充分和稳健的理解。

其次，在资料维度，质性研究应该形成多类型资料的学术规范。所谓多类型资料，是指一项研究应该包括访谈、观察、文本、数据等多种资料。多类型资料相互印证，才能提升质性研究的经验稳健性，同时更好展现个案与社会结构、制度背景之间的关联。一些研究者把访谈看成是质性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资料类型，这种误解制约了质性研究方法的发展。访谈虽然重要，但资料的稳健性不足，容易出现主观偏误，需要与其他类型的资料结合，相互印证。要开展整体性的个案研究，就需要质性资料具有稳健性，因为稳健性的个案才能反映整体性的社会机制。因此，多类型资料是开展整体性个案研究的方法规范之一，也应该是今后质性研究的趋势，只有一种类型的资料，不能认为是规范的质性研究。例如，研究者想调研一个社区，访谈材料、政府文件、工作报告、统计数据、观察记录、视频材料、物理空间等，都是与社区相关的信息资料，需要相互印证。在多类型资料的基础上，研究者对社区的研究信息才是稳健的，才能反映社区治理的整体性机制。

第三，在理论维度，应该对个案的整体机制进行解释。整体性个案，显著的特点是其影响机制不局限于个案本身，而是在于个案所嵌入的社会系统。质性研究要呈现整体性个案，需要在理论层面能够从社会体系的角度解释个案现象。简单而言，就是从社会体系解释个案，而不是就着个案分析个案。整体性个案的研究，对质性分析的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研究者有更强的想象力，能够寻找到社会体系中的重要因素解释个案的特征。^① 例如，开展一项社区治理的研究，不能只从社区本身的因素（社区人口、地理位置、社区领导）来解释社区的运行方式，还需要从社会整体性治理机制来解释（财政体系、目标考核、干部制度）。^② 将整体性治理机制纳入到理论维度中，才能有更强的解释力，因为现代化必然带来治理的体系化。

总之，因为研究对象的变化，未来的质性研究，需要面对的个案有更强的社会整体性。要解释个案，就需要理解社会体系，这必然带来质性研究的方法演变。无论是经验还是理论层面，质性研究都将有更高的规范。在经验层面，需要超越单一个案的局限，对相关多个案进行考察，理解个案整体；同时，需要有多类型的资料作为实证基础，提升个案研究的稳健性。在理论层面，质性研究需要纳入社会体系的分析视野，能够从社会体系的多层面因素解释个案的特点，从而在个案研究中实现对社会整体的理解。^③

（二）分析方法：话语与文本的多元分析能力

在分析方法层面，质性研究需要在研究者主观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和吸纳新的资料分析技术，特别是大规模文本资料的处理能力，以及文本与数据资料结合分析的能力。计算分析的技术对质性研究产生了挑战，一部分传统的质性分析方法有被取代的可能。但同时，新的分析技术也对质性研究提供了创新的可能，可以与传统的资料分析方式结合，为质性研究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新的分析技术，可以超越传统的研究者主观资料分析的一些局限，比如主观性强、资料分析规模小等问题，提升质性研究的可靠性。因此，未来的质性研究资料分析，应该是一种多元分析能力，既有传统的研究者主观分析，同时也结合计算机的大规模话语、文本分析。多元分析能力的优势是处理类型多、规模大的质性资料。传统的研究者主观分析，能够通过研究者的深入理解，对资料的内在逻辑和信息意涵进行解读，梳理质性资料的内在逻辑；而新的计算分析技术，能够对质性资料有大规模、标准化处理的能力，提升资料分析的效率和客观性。^④ 两种分析方式的融合，能够给质性研究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学界要重视新的分析技术在质性资料分析中的应用，但不能陷入技术主义的误区，认为新的分析技术一定可以全面取代传统的质性研究。计算机的资料分析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情境脱离。量化研究的数据是标准化的，但质性研究的资料是情境性的，需要结合到具体的事件情境来分析。传统的研究者主观分析，能够有较好的情境带入性，对资料的分析较为立体深入。而计算分析技术只是对话语和文本进行一般化的判断，不能回到情境中将资料立体化解读。所以，虽然计算分析技术能够大规模、客观化处理

① 陈家建：《主体领域与学科传统：对社会学研究议题的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② 吴晓林：《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③ 渠敬东：《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2019年第1期。

④ 刘河庆：《文件治理中的政策采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家和省级政府政策文本（2008—2018）数据》，《社会》2020年第4期。

质性资料，但不能独立于传统的研究者资料分析法单独应用。在将来的质性研究中，传统的研究者主观资料分析方法应该是主体，搭建资料解读的逻辑框架；而新的计算分析技术作为辅助，对大规模的话语和文本进行客观分析，帮助理解质性资料的信息细节。

除了资料性分析，新的计算分析技术，特别是生成式大语言模型（Generative Large Language Models）在质性研究的理论性分析中有所应用。有研究者认为，以 GPT-4 为代表的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开始具备动机理解、情感理解、一般推理等能力。^① 这些能力的具备，使得研究者可以用大语言模型协助完成质性研究的理论建构工作，包括扎根理论的编码、理论演绎的分析框架设计、文本理解与诠释、一些因果推理等。相比于资料分析，理论分析的任务难度更大，所以目前此类研究应用并不多。而且，理论分析当前和今后，应该都是研究者的核心工作，不能被计算机所取代。但作为一种学术趋势，将来的质性研究，或许会有更多的计算机分析技术介入到理论分析中。因此，质性研究的学者需要了解并掌握这些新的分析方法，将其合适应用，推进质性研究更多元化发展。盲目崇拜新技术，会导致质性研究丢失精神气质和学术内涵；盲目排斥新技术，会导致质性研究视野狭窄、僵化不前。

（三）范式层面：多元方法的混合研究

社会科学本来应该是议题导向，方法都是为研究问题服务的。但现实的学术体系已经变成了方法导向，由方法选择议题，并且不同的方法之间形成了学术领域的壁垒。但学术发展应该回到议题导向，为了解答某个学术问题，不同的方法综合使用。未来的学术研究，没有特定的议题属于质性方法，质性研究需要与其他方法结合，混合研究成为常态。

如前所述，质性研究面临学术范式竞争带来的困境。传统的质性研究具有自然性、开放性、理解性三个方面的特点，在社会科学中一直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产生了大量经典的作品。但大数据研究的兴起给质性研究带来了冲击，因为大数据也部分具有自然性、开放性、理解性的特点，会对质性研究产生一定的替代性。这样的替代性当前还不明显，但随着大数据应用的增加和方法的演进，这样的趋势会逐步显现。面对这样的学术趋势，质性研究需要吸纳其他研究范式作为补充，提升质性方法的研究能力。两方面的方法趋势值得重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结合、质性研究与大数据研究的结合。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多元方法混合，是从质性研究的角度讨论，即将其他方法范式作为补充来提升质性研究的分析能力。

1. 质性研究可以借助量化研究提升分析框架的解释力。

量化与质性研究可以多种方式结合，比如：可以通过量化发现经验问题，寻找变量间关系，再通过质性研究提出解释。^② 但这种结合的方式实际上是让质性研究辅助量化研究。从质性研究的角度，量化研究也可以给质性研究做补充，提升质性研究的解释力。质性研究擅长提出解释机制，但难以对机制进行验证，这导致很多质性研究提出的解释机制比较随意，脱离经验现实，不具有解释力。而量化研究的数据分析，可以帮助质性研究验证、修正、补充解释机制。笔者曾经开展过一项混合研究，尝试将质性与量化方法结合，该研究在《项目制的“双重效应”研究》一文中有所展现。^③ 研究的主题是基层的项目资金，研究发现不同层级的政府对项目资金的分配导向不同，中央政府是倾向于扶贫助困，而地方政府倾向于扶持优势地区。那这是什么原因？通过案例分析，笔者提出一个解释机制：行政压力会导致目标替代。地方政府面对上级的压力，需要完成项目资金的财政验收，就需要打造亮点，导致资金往优势地区聚集。但这一解释机制是来自案例研究，研究解释力难以验证。为此，笔者结合量化研究进行补充分析。通过搜集不同类型县域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财政直管县因为面对的层级少，行政压力小，所以较少出现项目资金的优势聚集。这一分析验证了质性研究提出的解释机制，压力的大小影响了地方政府分配项目资金的导向。这项研究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尝试用量化逻辑来验证质性分析的框架，应该说是有意义的尝试。未来的质性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个案分析，需要突破个案分析的限制，借助量化研究的分析，提升理论框架的解释力。特别是在整体性个案越

① OpenAI. (2023). Gpt-4 Technical Report. *arXiv*.

② 朱迪：《混合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研究策略及应用——以消费模式研究为例》，《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③ 陈家建、巩闯：《项目制的“双重效应”研究——基于城乡社区项目的数据分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2期。

来越重要的当代社会，大量的研究结论必然涉及社会系统的宏观因素，个案研究会出现“解释力弱化”的问题。“解释力弱化”，是指因为个案嵌入到社会的程度提升，从个案之中提出的机制解释力降低，更多的解释因素来自社会的系统性层面。在此情境下，个案研究的解释机制难以靠质性方法本身提升，需要借助量化研究的优势，以数据分析作为辅助，来形成更具有解释效力的质性研究结论。所以，与量化方法结合，不是一种学术时髦，而是质性研究面对社会变化和学术竞争时，追求研究解释力提升的必然要求。

2. 质性研究需要尝试与大数据研究结合。

大数据研究与质性研究是竞争关系，因为两种研究方式都具有自然、开放的资料特征和主观理解能力；同时，两者也是融合关系，可以相互补充和验证，形成更强的分析范式。具体而言，对于质性研究，大数据的方法可以在三个方面增进研究能力：对个案信息的补充和拓展、解释机制的提炼、解释机制的验证。首先，大数据可以增进质性研究对个案的理解。质性研究虽然围绕个案展开，但一项质性研究并不能保证对个案有完整的呈现，调研条件、主观局限、调查能力等因素，都会造成个案信息的部分缺失。尤其是在个案整体性特征强化的当代社会，要考察一个个案，需要理解社会体系的整体性信息，这已经超出了个案研究的能力。在此情形下，大数据方法可以作为有益的补充，帮助质性研究补充个案资料，拓展关联信息。例如，在村庄研究中，研究者以某个村庄作为个案开展调研，虽然可以搜集到一个村庄的深度信息，但难以判断一个村庄在当前乡村治理中的整体定位。而大数据的分析可以帮助理解个案在整体中的意义，比如财政收支的大数据可以判断这个村庄的经济和公共服务水平，政策文本的大数据可以理解村庄治理的政策环境。大数据的分析可以让质性研究对个案的理解更全面立体，展现个案的整体性意义。其次，大数据研究可以帮助质性研究提炼解释机制。机制解释是质性研究的优势，但既有的质性研究只是从个案中提炼解释机制，对因果关系的判定存在很大的局限。大数据的作用是可以模型方法找出关键要素，并对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判定，可以为质性研究的机制解释提供一些指引。比如，研究一项政策执行，从个案本身是不容易提炼出合理的机制解释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因为个案不具有充足的信息用于考察不同因素间的关系。^① 在此情形下，大数据可以帮助开展机制分析，研究者可以搜集该项政策相关的多重数据，比如政策文本、财政数据、地理数据等信息，用大数据的分析对政策执行的成效和影响因素进行模型分析。大数据的结果可以指引个案分析的方向，让质性研究可以较为合理的提出解释机制。第三，大数据研究可以对质性研究的解释机制进行验证。量化研究可以对质性研究的解释机制进行验证，大数据研究同样可以。特别是在大数据丰富的领域，质性研究的解释机制有验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总之，在未来的质性研究中，多种研究范式的结合应该是学术发展的趋势。而且，质性研究不是被动地让其他研究范式取代，可以从质性研究的特点出发，将量化研究、大数据研究作为辅助，弥补传统质性研究的不足，提升质性研究的学术分析能力。虽然当前此类研究还没有出现典型的实例，本文在此只能是抽象的论述，但如何将其他研究方法“为我所用”，这是质性研究者必须提早考虑的问题。

四、小结：质性研究是发展中的方法

质性研究虽然传统，但不是一成不变，规范性在逐步提升，是发展中的方法。^② 发展来自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变化，使得方法必须跟进调整；其次是其他方法的竞争，让质性研究必须吸纳借鉴新的技术和规范，提升研究能力。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和方法竞争都非常明显，使得质性研究出现困境，且必须面对新的发展趋势。在研究对象层面，现代性的发展使得社会体系的连带性强化，国家层面的治理体系具有越来越强的影响力，这对个案研究形成很大的挑战。现代社会体系，让个案特征从个体转变为整体，要研究个案，需要理解社会体系，这给质性研究带来了方法层面的困境。在方法竞争层面，计算社会科学带来新的资料分析技术，部分取代了研究者主观资料分析的方式；同时，大数据研究具有的自然、开放、理解的特征，与质性研究形成了竞争关系。研究对象和方法竞争两方面的变化，都让质性研究面临困境。

① 赵鼎新：《质性社会学研究的差异性发问和发问艺术》，《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5期。

② 王宁：《走出质性研究的三个误区——论青年研究的规范化》，《青年研究》2022年第3期。

但困境也在促成质性研究的演进，新的分析技术、方法规范在逐步产生。在分析内容层面，多个案例饱和式调研、多维度资料、社会总体机制解释是重要的发展导向。在分析技术层面，话语和文本的多元分析能力是质性研究的发展方向，能够更大规模处理资料，并尝试进行理论建构。在分析范式层面，未来的质性研究可以借助量化研究和大数据研究，在个案信息拓展、解释机制提炼和解释机制验证多个方面提升研究能力。总之，质性方法不能因为研究个案就视野窄，反而应该有比其他研究方法有更宽广的格局和更丰富的想象力，能够从社会整体理解个案，同时吸纳其他方法的长处，填补传统质性研究的短板，让质性方法不断有新的生命力。

本文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需要交代。首先，质性研究从抽象的范式到具体的方法，不同学者的理解差异较大，本文侧重于从社会科学的解释路径来分析质性研究方法的特点，未能兼顾人文学科的阐释路径。所以，文章的观点只能说对一类风格的质性研究较为适用，对其他风格的质性研究存在解释局限。第二，学术困境与发展趋势很多还是潜在逻辑，并未充分显现，本文的一些判断短期内不一定会成为明确学术现象。但正因为如此，才有讨论的意义，可以借此厘清质性研究的传统特征、当前问题和未来导向，呼吁广大学者更多关注质性方法的传承与创新。

[感谢陈苗、刘河庆、王宁三位学者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的批评和帮助。]

(责任编辑：朱颖)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Method Comparison: Traditions,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CHEN Jijian

Abstract: The social sciences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methodological diversity.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qualitative research has traditionally held advantages in three areas: naturalistic inquiry, open-ended exploration, and interpretative understanding. However, challenges have emerged for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ree key dimensions: empirical validity, analytical techniques, and methodological paradigms. These challenges stem from advancements in holistic case analysis, evolving analytical technologies, and the rise of big data research. These pressures are driving innovation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erms of analytical content, critical developments include multi-case saturation studies, integr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data, and explanations of broad social mechanisms. For analytical techniques, enhancing discourse/text analysis capabilities and scaling qualitative data processing are key priorities. Methodologically,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increasingly integrating with quantitative and big data approaches to expand case information systems, refine explanatory frameworks, and strengthen validation processes. This evolution aims to enhance rigor while preserving qualitative research's core strengths in contextual depth.

Key words: qualitative research, holistic case study,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big data research